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in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Ecosystem Theory

Ye Mei

Qingdao Harbour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266404, 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type of education has opened a golden 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mission and goal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for the practice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ir own growth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social stage and soci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ra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tudie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governanc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in line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o use the ecosystem theory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onstruct a scientific governance system. Specific considerations are: (1) accurate cogni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an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 (2) careful planning: create scientific school-based governance charter to drive planning realization; (3) accurate aggregation: accumulate multiple subjects to realize the linkag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4) fin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latform thinking to promote the "three education reform" to take root; (5) fine Governance: block Chain technology constructs a new ecolog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ecosystem theory;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ability; education ecology; blockchain education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建设

梅叶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山东 青岛 266404

摘要：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时代。职业院校的使命和目标是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其自身的生长渐进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段和社会条件。阐述了职业教育的时代蕴含特征和要素构成，由此研习了职业院校治理中突出的难题。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具体考量为：（一）精准认知：准确把握职业教育质量内涵发展诉求；（二）精心谋划：创立科学校本治理章程驱动规划变更；（三）精确聚合：积聚多元主体实现高职教育联动发展；（四）精细运维：平台思维推进“三教改革”落地生根；（五）精进治理：区块链技术建构高等职业教育新生态。

关键词：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理论；现代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教育生态；区块链教育

1 引言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以下简称《方案》）确立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

育的定位，指出“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1]。中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早，开创和沿袭了以“普通校——骨干校——优质校——双高”为主线的时代引领，历经规模膨胀、特色竞优、专项培育进入高水平的质量提升阶段。2019年3月，《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双高计划”），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

【作者简介】梅叶（1978—），男，汉族，中国陕西人，副教授，从事高职教育与智慧港口运营管理研究。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基于高职专业核心素养的实践性教学改革研究”（编号：2020ZC392）研究成果。

育的定位，指出“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1]。中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早，开创和沿袭了以“普通校——骨干校——优质校——双高”为主线的时代引领，历经规模膨胀、特色竞优、专项培育进入高水平的质量提升阶段。2019年3月，《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双高计划”），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

十九大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引领。职业教育必须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产

业进步培育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2]。因此,我们要正视职业教育历史认识、发展阶段、成长演进;克服教育体系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实训薄弱化、产融融合不深入、发展动力疲软、人才质量不高,治理能力低下等问题;着力提升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 职业教育时代蕴含与特征内涵^[3]

正确认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和特征内涵,领会职业教育的本质。《方案》和“双高计划”为此做出深刻阐述。

2.1 职业性: 对接产业和新业态的岗位实用性

从世界范围内看,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是其最为本质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迁移。其主要体现在:社会产业适应性、岗位吻合性和实践操作性。职业性是一个时代发展范畴,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管理制度、核心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社会产业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对接生产力发展的宏观需求向度^[4]。它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综合体现。职业教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服从服务于社会产业的发展需要,为之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社会产业体系和架构产生不同的岗位,职业教育对接产业产发展并提供与之对应岗位,以满足产业发展内涵驱动的要求。

岗位吻合性是基于职业教育对接社会需要的微观向度。岗位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生产运营方式和社会管理模式,具有特定的内涵逻辑,富有特定社会烙印。同种岗位准入要求、运营流程和技能素养随着时代发展而迁移。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蕴含特征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与时俱进,而产教融合为实现职业教育对接产业发展岗位吻合开辟了重要路径。实践操作性是职业教育满足产业服务社会的显著特征。《方案》明确职业教育作为类型的定位,与普通高等教育拥有同等重要地位。

2.2 融合性: 专业与行业的跨界和融合赋能性

社会化大生产的人才诉求素养呈现强基础、宽口径。这是由万物互联、融合赋能,学科边界模糊、边缘科学兴起的发展规律决定的。互联网、物联网、5G技术、自动化、云计算等新兴科学技术推进人类对社会发展和教育认知^[5]。未来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等更加注重强大的基础培养,而大专专业、大行业的趋势更加明显。教育部关于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调整,表明大专业成为普遍共识。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要趋于跨界性,专业融合赋能,这是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

2.3 精进性: 职业素养养成与专业品格创新性

中国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要求提升产品品质 and 消费质量,倒逼产品品质不断提升。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的人力资源,必然提升本身的综合素养。职业教育要立德树人,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健全技能人才培养,培育大批工匠人才,推动产业发展。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就是要注重培育学生精进的工匠精神。具体体现在:行业的认可度、岗位的忠诚度、技能的精准度、业务的精细度和实践的创新度。这是构成职业教育核心素养的驱动内核。

2.4 文化性: 立德树人与优秀文明继承传播性

职教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功能更多体现在匠技强人、匠品育人、匠心铸魂的理论教育、仿真实验和实践教学,还包括职业教育内化于人的品格养成和终其一生全过程。承担立德树人根本使命就是要职业教育继承和传扬优秀文明、解读文明密码、传递文明基因、铸造文明风尚。

3 职业教育构成要素

根据要素论基本原则精神,职业教育的要素包括:流体要素、载体要素和流向要素。运用要素向度构成理论,研究职业教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探索职业教育运用规律,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

流体要素就是职教教育的培育对象。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培育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才。设置职业教育要素系统,对职教教育的对象进行分析,解决好培养对象的定位。职业教育的对象主要包含中职生、普高招生、退伍军人和扩招社会生源;年龄阶段主要集中在16岁-25岁之间的广大青少年。根据《2019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目前中国普通高职(专科)院校共有1430多所,在校学生规模近2000万人。未来,职业教育的对象和层次将不断拓展。

载体要素就是指流体借以培育的平台路径。包括职业教育的体制、培育模式、资源要素和培育机构。这是职业教育培育对象的重要载体和路径。中国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系统化的职业教育载体,致力于提

升职业技教育质量。职业教育的载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设施，如职业学校、实验室、教师、教材、实训基地等；另一类运营体制，如教学模式、资源平台、研究方式、育人体制等。

流向即是流体从起点到终点的流动方向。职教教育的流向主要包括以下四种：（1）自然流向。按照既定的人才培育模式和运行机制，教育对象入校——接受培育——评价技能——毕业入职。（2）指定流向。根据职业教育的载体对于专业和培育对象的差异，双向融合互选后制定的流向完成培育，达到应有的技能和素养。（3）市场流向。产教融合和现代学徒制下，作为职教教育要素系统的职业教育对象——订单班、委培生等，接受来自人才市场检验和企业诉求评估，人才培育机构给予传统培育方案对接企业的市场导向。（4）综合流向。对于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尚未建立完全配套于是相适应的“入门制度”、“高效培育机制”和“社会公允”，培育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复杂多元，路径和方式交互融合，因此，流向上呈为综合性。

确立职业教育构成要素的“流体-载体-流向”理论，便于站在更高层次探究职业教育的认知规律，开辟职业教育研究视角，聚合多元要素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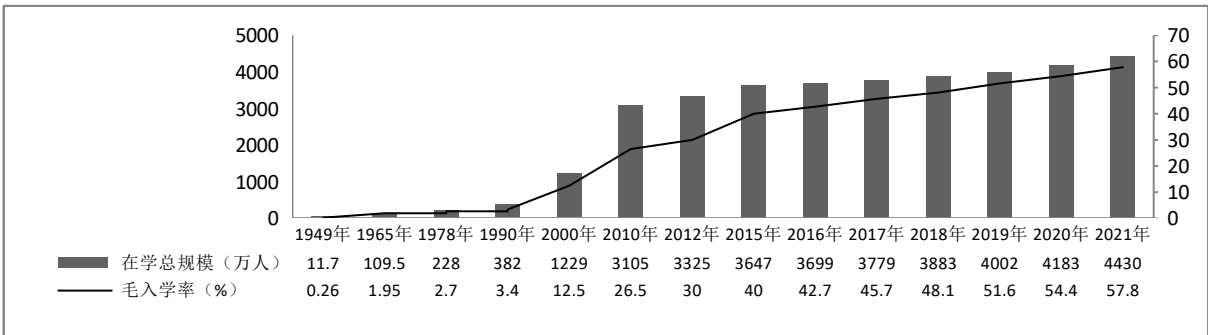
4 职业院校治理中突出的问题

职业教育的治理，围绕“谁来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核心问题而展开^[6]。中国职业教育始终紧紧围绕这一根本问题，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特别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职业教育取得深刻认知和丰硕成果。这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与此同时，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反映了职业教育的深层次矛盾。这也为职业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4.1 认知障碍：次等教育的惯式思维向度认知

职业教育萌芽较早，发展源远流长，路径曲折多变。从隋唐时代确立科举考试制度以来，教育作为提升人的基本素质和激发进步升迁的功能不断加强。资源稀缺、社会生产力进步和政体特定的条件下，高等教育作为人的分层分级功能无以避免大的被强化和扩大，即使中国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和扩大，仍然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2021年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其中高等职业教育稳占半壁江山。如图1所示。按照国家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看，中国职业院校的数量和在校学生与普通高等教育院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也呈衡平状态。



——数据来源：网络资源

图1 1949-2021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与毛入学率统计图

201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含独立学院257所)，比上年增加25所，增长0.94%。其中，本科院校1265所，比上年增加20所；高职（专科）院校1423所，比上年增加5所。中国成人高等学校268所，比上年减少9所；研究生培养机构828个，其中，普通高等学校593个，科研机构235个。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11260人，其中，本科院校15179人，高职（专科）院

校7776人。

索源发现，职业教育（含中职和高职）入校资格的遴选，基本出于普通高等教育遴选完毕的二次遴选或者提前“次等遴选”，这就固化了职业教育的入学遴选的次等选择的现实。相对于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沿袭千年来“学而优则仕”，重智力劳动轻体力劳动的习惯认同，这种传统思维定式继续发酵，使得

职业教育“次等地位认同”加强：职业教育入门要求低、人才培养资源配置有限，职业教育教师地位低下、人才入职社会认同较低和职业成长受限等因素联合制动。

职业教育成为类型教育的国家定位明确以来，设置了职业教育的成长发展通道，监管后续系列文件基于倾斜和支持，然而较长时间，仍然不能改变“职业教育为次等教育社会认同”，学生报考职教职业教育的意愿不强，这种认同形成制约职业教育发展战的重要思想桎梏。特别在职业院校从“普通校——师范骨干校——优质校——双高”的逻辑发展竞优选择中，非入列职业院校面临生源不足生源质量下滑的双重困扰。

4.2 体制障碍：类型教育体系尚未贯通和完备

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立，首要解决职业教育规划的系统性设计和实践性递进性问题。鉴于中国职业教育借鉴普通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同时参照产业发展的实践状况，其培育人才定位于实践操作层面的“金蓝领”应用人才。

职业院校在治理中存在的体制障碍主要表现在：

- （1）新的职教高考尚在探索，“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应用型研究生”尚未落地生根，点-线-面如何落地生根？
- （2）职业教育学生的职业发展障碍客观存在，无法享受与普高同等机遇；
- （3）多元主体举办职业院校受制于多方制约的体制机制仍存在，权力下放导致的“任性治理”或者“越权治理”“混乱治理”，使之内耗过大，成效“虚漂”；
- （4）职业教育工作者在多种主体的指挥和掣肘下，无法享受到合理的职业权利和职业待遇，难以专心致学和精心育人；
- （5）过分放大的职业教育市场化诉求，赋予职业教育太多的功能，吞噬了职业教育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发展的公共属性和本质属性。

上述种种因素，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性设计和落地让然存在“断章取义”的胶着阵痛。

4.3 融合障碍：职业教育产学研融合维度有限

职业教育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强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聚合社会活跃要素参与职业教育发展。考虑到职业教育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和收益成效，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十分有限，意愿并不强烈。近年来，“校中企”和“企中校”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学校与企业对接、教师

与企业师傅对接、校本课程与实习课程对接、仿真实验与企业工作对接、实训教学与岗位实习对接、理论考评与实践技能考评对接。由此诞生的订单班、实验班、定向委培班等诠释产学研融合发展。有些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参与人才培养、产品设计、设施设备共享和联合举办赛事。甚至出现校企联合专业学院/专业的“校中校”。

研究发现，“红利”驱动校企融合，“成本—利润—收益”为考量主线。而真正育人本源工程融合较浅。比如，校企合作资源共享的深度广度，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的融合度，产学研联动赋能的厚度，职业教育对象职业发展的宽度等仍有巨大空间，这也是职业教育治理能力低下的重要体现。

4.4 发展障碍：校本“孤岛”迷茫与创新焦虑

职业教育是一个生态治理体系。发展要遵循职业教育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职业院校治理工程，既要符合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要求，又要在芸芸众生的职业教育生态圈中国培育核心竞争力。

职业教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精准定位、系统设计、协同发展，构建适合自己的治理体系。“双高”战略以来，很多省份联合教育部开展职教高地建设，“一校一方案”成为共识。国家和省事办法系列方案，推进校际交流，促进专业发展，提升治理能力。但是职业教育的大格局中，各校的实际情况优劣势不同，既要服从国家统一规定，又要突出本校特色，实施差异化竞争治理策略并非易事，校际之间竞争合作，校本“孤岛”迷茫加深。主要表现为：校际之间信息资源共享有限，战略规划内涵系统性乏力，发展执行系统性协同性较弱，创新治理能力驱动疲软。

近年来，产业发展驱动“大专业战略”趋势加快，部分小种专业退出国家专业目录。职业教育发展的障碍较多：经费的足额保障与管控；没落专业如何演进；大众专业如何发扬优势；“专业+学校”的招生模式如何对接校本实际；职业教育工作者身份待遇如何匹配；校本教育教学诊改评价如何落实与追踪。

4.5 路径障碍：赛事万象与教育自治赋能不足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初心，旨在激活多种元要素，提升育人质量。然而，名目繁多的赛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谋取名利的重要手段，蚕食了职业教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

力等资源。干扰了立德树人、匠心铸魂的育人系统工程，一定程度上降低职业教育治理的成效。甚至出现离开赛事就没法办学、学生离开赛事就没有兴趣、离开题库就不会考试。

赛事和各种检查填报掣肘了正常的育人秩序。政府、市场、企业、家长、学生参与评价，赋予了职业教育“万能之驱”，大有凡是普通教育以外的事情，职业教育能干的“打包思维”。职业教育工作者要教书、科研、更要冻行业、会办“办企业”，既是老师，又是企业家，还得是赛事运动员，承担了更多社会角色。面对赛事万象和身份多元，职业教育如何以自治赋能和育人使命？

赛事导向补齐职业院校“短板”，衍生教师在业绩评价、职称晋升、实务升迁的“隐形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或者误伤了真正的育人工作和积极因素。局部职权过大，掌控资源分配，滋生新式团体利益固化，加速顽疾蔓延。

5 建构生态系统理论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

治理的内涵在于“法制、民主、协商、效率、共同体”的协同一致^[7,8]。治理是一种在领导层权力体系主导下，协调被管理层共同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教育生态系统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它是一种有精准目的的系统设计，包括系统内生态功能和系统外生态功能。其内在功能为育才，其外在功能为社会价值，即文化传递和文化协同。运用教育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职业教育内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规律，解决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这是科学有效的方法。

5.1 精准认知：准确把握职业教育质量内涵发展诉求

1.厘清职业教育内涵特质，提升把控职业教育发展趋势能力。

首先，要在研究职业教育发展历史中解读中国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发展规划、功能演进。保持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定力、认知热情和认知自信。政府引导职业院校，把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与实践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纳入职业院校及从业者的重要导向性约束指标，内化于职业教育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一始而终，与时俱进。内化于心，渗透与行。职业教育定位与发展有着特色的生长发展背景，并且受制于国家

战略的总指挥和战略布局^[9]。以《方案》为引领的系列国家文件和规范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逻辑、发展路径、发展目标做了系统的论述。沿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和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道理，坚信职业教育系统性规划落地生根，必然能走出康庄大道。

其次，要演进和发扬职业院校校史、寻求并坚定专业自信。职业教育要素理论的载体是学校、专业、教师，而就业市场导向对学校、教师、专业的检验更多体现在作为流体要素的学生，从而反馈给载体要素，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市场认可度、评估度和影响度。高水平专业带头人制度引领专业发展，能够较好的提升全员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职业能力好职业自信，把握并致力于专业建设、精准认识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三是学校建立职业教育工作者职业成长平台，指导帮助他们提升职业综合素养。职业教育工作者要要我觉悟、自我提升、自觉成长。正所谓，处处苦逼，人生如是；自编自导，人生美好。唯有自我觉悟，才有觉悟的团队；唯有不断认知，方有精准把控；唯有深入其中，才会有所收获。发挥团体协同治学能力，成就专业、成就团队的同时成就个人的发展和职业成长。

2.建构职业教育认知共同体，提升职业教育文化递延能力。

职业教育认知共同体，是基于对职业教育共同的认知理念和共同行为价值的考量而聚合的组织，并非对职业教育要素的简单集合，要求对职业教育关联要素有共同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和道德约束。

调研发现，职业教育从1904年的“癸卯学制”到建构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今天，中国职业教育教育的共同体尚未取得深入发展。职业教育文化立校困境逻辑仍然面临重重困难，而发展滞缓。建构职业教育认知共同体，首先在目标逻辑、价值理念和道德约束上具备同质属性，深挖并培育校际文化，通过文化立项、文化传承、文化内化，提升对职业教育的文化递延能力。职业教育虽然表象是专业，但是终于实践、长于操作，成与传承，而最终极路径在于职业教育文化体验能力^[10]。

3.探索职业教育运营规律，提升职业教育实践生成能力。

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具有跨界性、融合性、实践性、创新性。职业教育主体多元、产教融

合、专业跨界、重在实践，业务创新。这些规律特质决定了职业教育在运营，把控学校庙堂教育与实践养成的交互融合。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和教师不仅要搞好专业理论育人工程，更多的要提升其运营规律的把控。比如教师进企业、企业教师进学校，双师实践养成、现代学徒制等。这为提升职业教育实践生成能力提供了通道。

5.2 精心谋划：创立科学校本治理章程驱动规划变现

职业院校内部治理“表象光鲜”，实际“丑态百出”：计划背离实际、职能分工失衡、人职匹配混乱、责任隐性转移、权利交互寻租、管控松散低效、考核虚化任性等^[1]。这种高能耗、低效能的内部治理现状，受其制度文化、地缘惯式、机构设置与信息技术等多维度。

1. 建构校本发展系统规划态运营控制系统

职业教育院校不缺乏发展规划，但缺失的科学性系统化的规划设计。职业院校要贯彻法人治校理念，建构校本发展系统规划生态运营管控系统。确立系统性发展规划和阶段性运行指标，导入信息技术开通运营平台系统、开发开放多元接口，全程透明公开，动态介入运用“纠偏”，实施标准化管理。约束校长个性化权利，终结“官本位，校长至上”思想影响，下大气力终结“一任校长一朝君”、“一任校长一个口号”、“新官不管旧事”的代际遗传惯势。倡导职业教育校长和职能部门服务教育教学、服务师生、服务社会、服务企业的理念和职业操守。

探索实施职业教育教师合作制劳动关系，以确保职业教育工作者合法权益不受制肘，保持独立性，较好发挥参与职业教育校本管控治理作用。提升学术至上主体地位、探索扁平化管理、权力下沉，完善校院二级管理等方面改革，科学重组权力结构，完善内部治理体系。

2. 搭建平台丰富完善新时代“教授治校”体制

观之实践，中国沿袭几千年来科举考试制度和官办教育的主流思想，教育行政化势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有加强之势。特别是教育全面改革以来，产业化趋势加剧，新型“教育行政化”驱使权利运行变相集中：有官位就有资源，有资源就能竞优，有竞优就有更多更优质资源，如此反复循环。

倡导教授治校思想的关键就是去行政化，保持教

授学术独立、思想独立和行为独立。当前权利下放后，教授的晋升考核牢牢掌握在学校的职能机构手中。不乏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形，教授在整个学校中组织结构中处于底层，发言呼声微弱。“教授治校”实际效能有限。

职业院校必须要提升站位，努力提升教授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引领与作用^[12]。无数实践证明，依靠教授治校才是提升治理能力的科学选择，保持教授的独立性，而排除各种掣肘和干扰，千方百计搭建平台，以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数据溯源、数据自动检算、数据可视流转，实现规范性与高效性、真实性与精确性、创新性与服务性的协同统一，丰富完善新时代“教授治校”体制。

3. 优化并挖掘校本“智慧职教平台”诊改功能

职业教育的根本和基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新时代优质人才，满足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需求。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最为关键。当前，职业教育质量的把控由评估制改为诊改制，这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文化自觉。

目前，绝大多数职业院校已经开发并投入使用“智慧职教诊改系统”，努力推进教育教学诊改。探索导入1+X证书制度管控，丰富学分制银行功能。所谓质量好不好，赛场见分晓；所谓功夫到不到，自己最明了。因此，优化并挖掘校本“智慧职教平台”诊改功能，夯实教育教学基础环节，系统诊改，自觉纠偏，把实现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育人过程作为头等大事坚持不懈做下去。

5.3 精确聚合：积聚多元主体实现高职教育联动发展

根据行业/专业的优势，高职院校要自觉集聚凝练职教文化，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互融合，精准聚合多元主体要素，致力于校本规划，实现高质量的联动发展。

1. 创设校本职教文化，聚合“行业互补、校友共济”职教资源。

职业教育院校要自觉文化觉醒，贯通职业教育历史变革，传承校本历史基因，揭秘发展密码，精准凝练校本文化，多元传承校本文化品格，形成以校友、行业与在校师生为主体的校本文化传承载体，以行业专业为引领，优秀校友为代表，名师为代表，彰显校本文化魅力，聚合院校专业为背景的行业互补，校友

互济职教资源。夯实资源基础,拓宽治理能力。

2.搭建多元融通平台,推进多元主体的混合制职业教育模式。

针对职业教育资源与人才培养吻合度不高的现状,职业院校主导,引进社会资源,民间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以合作制形式探索实施校中校混合制教育模式。

3.建构跨界思维逻辑,探索“共建共享、合作共赢”融合路径。

跨界性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产业结构呈现交互融合与边界模糊趋势,职教教育必然顺应这种趋势,实时提升人才培养内涵。《方案》和《双高计划》表明,鉴于学校、学生和企业共同的诉求,职业院校应加快探索实施“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新型融合路径,努力提升人才培

育质量。中国进入智能化自动化阶段,专业跨界与行业边界虚化要求大专业与兼容性与之对应。因此,高职院校了自觉的通过合作实训室、校外实训基地、合作商品检验、合作项目开发、合作技术开发、合作服务创新、合作标准探究……等拓展治理能力。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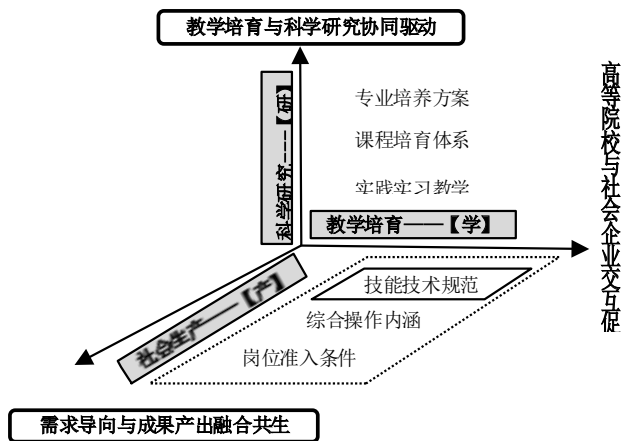


图2 “产学研”三维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5.4 精细运维:平台思维推进“三教改革”落地生根

职业教育贯彻立德树人、三全育人和课程思政,精细运维“三教改革”。修订符合培养目标、明确可衡量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梳理人才毕业要求达成的课程组成与关系,突出厚基础、宽口径、实践性和创新性。

教师确立专业成长计划。高职院校帮助和指导教师制定职业发展规划,促进职业成长。教师自觉具备

理念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强,人格要正。千方百计加强道德信念、提高学术水准、提升育人技能、丰富知识视野。承担起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遗产的使命。

教材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探索平台模块课程体系设计。选用教材中做到有所取舍,参照书本而非全部依靠书本。开发校本教材不仅在内容上突出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按照互联网新型立体化教材要求开发。

教法上贯彻课程思政育人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助。针对新生代学生学习习惯和特征,结合职业教育的要求和实际,突出有趣、好学、便于操作。开展翻转课堂、线上线下互补混合式教学模式等。创造高校优质课堂。

5.5 精进治理:区块链技术建构高等职业教育新生态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开放共享、独立性和不可篡改的安全性等特质,为我们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重构社会运营模式。区块链教育已经起步,并展开应用研究。加大气力,推动区块链技术建构高等职业教育新生态,深化职业教育精进治理方向和关键路径。

6 结语

职业教育的发展演变,在历史变革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成长规律和成长特征,担负满足产业发展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精准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机遇,运用生态系统理论设计职业院校治理体系,探索提升治理能力,坚持不懈探索和实践,才能不负时代光华。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EB/OL]. [2019-2-1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2/t20190213_369226.html.
- [2] 石伟平, 匡瑛. 中国教育改革40职业教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 [3] 姜大源.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专题笔谈[J]. 教育与职业, 2020, (20): 5-13.
- [4] 胡茂波, 邹世康. 新时代职教师资培养变革的诉求、框架及路向[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 42(31): 52-57.
- [5] 郑石明. 大数据驱动创新创业教育变革: 理论与实践[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 (2): 65-73.
- [6] 丁金昌. 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及其实施路径[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 (01): 129-132.
- [7] 庄西真.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双高计划”: 怎么看、如何干[J]. 职业技术教育, 2019, (24): 8-11.
- [8] 李永生, 袁蕊, 刘亚. 论“双高计划”背景下的学校治理水平提升策略[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 (34): 48-52.
- [9] 徐国庆. 职业本科教育的内涵、国际状况与发展策略[J]. 机械职业教育, 2020, (03): 1-6.
- [10] 陈明霞, 吴一鸣.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治理: 理论梳理与反思[J]. 职教论坛, 2019, (12): 6-11.
- [11] 崔发周. 职业院校行政管理绩效困境: 表层征象、深层原因与突破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0, (28): 64-69.
- [12] 程德慧. 基于权力结构重组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J]. 职教论坛, 2020, (02): 38-43.